



比較文學與文藝學叢書

QUANQIU YUJING YU BENTU RENTONG
BIJIAO WENXUE YU ZUQUN YANJIU



全球語境與本土認同

——比較文學與族群研究

徐新建 著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全球語境與本土認同

——比較文學與族群研究

QUANQIU YUJING YU BENTU RENTONG
BIJIAO WENXUE YU ZUQUN YANJIU

四川大學“九八五工程”文化遺產與文化互動項目

ISBN 978-7-80752-270-6



定價：27.00圓



比較文學與文藝學叢書

四川大學“211工程”重點建設學科項目

全球語境與本土認同

——比較文學與族群研究

徐新建 著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全球語境與本土認同——比較文學與族群研究 /
徐新建著. —成都:巴蜀書社, 2008. 10
(比較文學與文藝學叢書)
ISBN 978-7-80752-270-6

I. 全... II. 徐... III. ①比較文學—文學研究—中國
②民族文化—研究—中國 IV. I206 K20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 169697 號

全球語境與本土認同
——比較文學與族群研究

徐新建 著

責任編輯	李 蓓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 成都市槐樹街 2 號 郵編 610031 總編室電話:(028)86259397
網 址	www.bsbook.com
發 行	巴蜀書社 發行科電話:(028)86259422 86259423
經 銷	新華書店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責任公司 電話:(028)85011398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03mm×140mm
印 張	11.25
字 數	270 千
書 號	ISBN 978-7-80752-270-6
定 價	27.00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調換

建構中的獨特

樂黛雲

我和新建相識已十餘年。我們共同的興趣大體建築在對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和比較文學的關注和愛好上。記得 1985 年，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成立大會召開時，我曾談道：“在這次大會上，少數民族文學可以說是第一次大規模登上了比較文學的講壇……少數民族比較文學是一塊豐沃的處女地。我們有理由期望一個輝煌的未來。”會後，以中央民族學院和中南民族學院為核心成立了中國少數民族比較文學研究會。新建一直是其中熱心的成員。他關於西南少數民族文學和文化的研究，如《西南研究論》、《中國傣文化研究》、《苗疆考察記》、《西南行走錄》等想來都是這一原始興趣的發展和結晶。後來，他的學術興趣向縱深發展，又成為新成立的交叉學科“文學人類學”的中堅力量。“文學人類學”結合了文學研究和人類學研究的雙重特點，一方面，重視對文學整體特徵及深層結構的概括；另一方面，又注意在以族群（民族）為單位的前提下，通過多元比較，努力把握和表達行為所體現的人類“整體性”。我對文學人類學所知無幾，但却很是着迷，幾乎在各種場合都會成為這一學科的吹鼓手。我看過新建這方面

的不少篇章，都是很有創意之作。今天更是慶幸他已是“侗族大歌的人類學研究”、“藏彝走廊的民俗遺產研究”以及“多民族國家的文學比較”等幾個大項目的學術帶頭人，深信他會創造新的輝煌。

最近，新建將他近十年來的論述彙集出版，主要是從全球語境與族群認同的角度審視文學和文化。他認為過去對中國“作為多民族共存之共同體及其傳統之多源與多樣”理解不足，強調不夠。他自己近年來就特別着重結合中國多民族國家的歷史傳統進行了跨學科的比較研究，集中討論近代中西交往中的族群書寫問題，包括理論專題和具體的個案分析。我一嚮以為，精彩的文集，其價值往往勝於鋪墊拉扯、湊合成文的所謂“專書”。新建的這本文集既關涉宏大的文學及其理論，亦觸及細微的民間案例，每篇都是努力在問題的對話中“接着說”、“往下說”，自有其創意。特別是最後幾章轉入“全球語境與本土立場”的討論，研究了本土認同與全球化的關係，強調“承認邊地是一種文明，意味着世人在相互認知上的演化”。他呼籲：既要超越歐洲中心主義，也要超越中國中心主義；“面對種種以己為中心的各式霸權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要“學會尊重弱小和邊緣”，“這是世人最為緊要的功課”！在我看來，現今世界，當務之急確實就是建構一個多元化的全球化，以代替威壓全球的單邊統治。新建的學術努力顯然有益於在這一偉大的建構過程中發出中國獨特的聲音，我們對此拭目以待。

2008年12月19日

《比較文學與文藝學叢書》編委會

主 編：曹順慶

編 委：馮憲光 王曉路 李 怡

徐新建 劉亞丁 閻 嘉

吳興明 劉文勇 段志洪

秘 書：姜 飛

目 錄

建構中的獨特	樂黛雲 (1)
引 論 從邊疆到腹地：中國的多民族文化格局.....	(1)

第一編 東西方的交匯

第一章 西方文論在中國：觀察、回顧與思考.....	(29)
一、“世紀末”的引進與論爭	(29)
二、“中華圈”的認同與離合	(36)
三、“後冷戰”的衝突與交往	(46)
四、“學術史”的承繼與拓展	(52)
第二章 批評的界限：語文分野中的文化選擇.....	(60)
一、批評與言說.....	(60)
二、從“語音標準化”到“族際共同語”	(62)
三、從“文化中國”到“漢語國際”	(66)
四、“文字本位”與“漢語精神”	(70)
五、多語“對話”與漢語“批評”	(74)
第三章 比較詩學：誰是“第三者”？	(78)

一、“現代漢語”與“中國詩學”	(79)
二、“中西比較”與“翻譯詩學”	(85)
三、文化之“隔”與“詩學對話”	(89)
第四章 文學人類學：中西交流中的兼容與發展	(96)
一、時代背景	(96)
二、西方源起	(102)
三、中國之路	(107)
四、學術主張	(115)
第五章 重新走向“總體文學”	(121)
一、提出緣起	(121)
二、相關爭論	(123)
三、中西比較	(126)
四、新的拓展	(130)

第二編 跨學科的對話

第六章 “地方”的含義：關於“全球化”的反向思考	(141)
一、“公元”二〇〇〇	(141)
二、“後軸心”時代	(144)
三、全球地方化	(147)
第七章 西南的“話語”：關於“中心”與“邊緣”	(150)
一、蘇俄模式與中國國情	(150)
二、新時期策略	(152)
三、走向正史與記錄少數	(154)

四、“一點四方”和西南書系	(156)
五、“衆聲喧嘩”與“西南話語”	(159)
第八章 邊疆的演變：從“野蠻”到“文明”	(162)
一、關於“中國”	(162)
二、關於“邊地”	(165)
三、關於“文明”	(169)
第九章 作為文化記憶的文學：伍略和他的《虎年失蹤》	(175)
一、省城眼光	(175)
二、社會歷史	(176)
三、古今交融	(178)
四、民族—地域	(180)
五、文化記憶	(181)
六、文學鄉土	(182)
第十章 流動的歌者：阿來創作論	(183)
一、作家、詩人、歌者	(183)
二、權力、族別、時間：小說虛構中的歷史與文化	(190)
第十一章 由死而歌：瞿小松和他的音樂意含	(218)
一、藝術治療	(218)
二、歌可以怨	(219)
三、祭祀演唱	(221)
四、因情宣泄	(222)
五、過渡—中介	(224)
六、由死而歌	(227)

第十二章 “新時期”與“新文學”：侗族作家發展論	(228)
一、“新時期”與新背景	(228)
二、老傳統與新繼承	(235)
三、“新文化”與“新文學”	(243)

第三編 族群間的異同

第十三章 瑶族語文：語言裂變與文化整合	(251)
一、多國民族和多民族國	(252)
二、石碑借文與族籍變異	(259)
三、雙語教育與瑶文創造	(269)
第十四章 侗族大歌：“文本”與“本文”的相關和背離	(273)
甲 A：春節晚會	(273)
乙 A：康拉德小說	(274)
甲 B：巴黎藝術節	(276)
乙 B：泰特羅講座	(278)
甲 C：京城鼓樓展	(279)
乙 C：從《詩經》到《東方紅》	(281)
甲 D：小黃寨的侗歌	(283)
乙 D：興觀群怨和卡拉 OK	(285)
甲 E：進城的歌手	(286)
乙 E：本文和文本：“隔山隔水難見面”	(287)
第十五章 苗族傳統：從古歌傳唱到劇本製作	(290)
一、口語傳承：古俗面對的誘惑與考驗	(291)

二、歷史敘事：族群意識的時代變遷·····	(294)
三、神話寓意：人類情感的深層寄托·····	(299)
第十六章 口語詩學：回到生活事相的比較研究·····	(304)
一、“詩學”界定：“新漢語”與“新詩學”·····	(304)
二、回到事相：從“文本詩學”到“口語詩學” ·····	(306)
三、比較詩學：“後文本”時代的新綜合·····	(310)
第四編 全球語境與本土立場	
第十七章 本土認同的全球性：民族文化的“三度寫作” ·····	(315)
一、現實生活中的“族群書寫”·····	(315)
二、作家創作的民族文學與文化·····	(317)
三、作為文化批評的學術研究·····	(321)
結 語·····	(325)
第十八章 和而不同：軸心時代與世界文明·····	(327)
一、以“和”對“多”，集散成大·····	(327)
二、以“和”制“合”，平衡互補·····	(330)
三、理想世界，“和而不同”·····	(332)
四、和平為本，共創文明·····	(336)
餘 論·····	(342)
後 記·····	(347)

引 論

從邊疆到腹地： 中國的多民族文化格局

“多元一體格局”這樣的概括，對演變至今的中國歷史及其多民族結構提供了一種有用的認識框架。但無論從歷史、地理還是族群文化等方面來看，其值得論證、展開的地方還很多。從理論上講，“一體”有待界說；在現實當中，“多元”尚不平衡；而從腹地到邊疆、從大陸到海島，各相互有別的諸“元”差異還需要深入分析和研討。聯繫中國歷史上的帝國治理傳統，從“邊疆”和“腹地”兩個角度及其相互對照加以論述，便可對多元之“元”及其所體現的不同之“多”做出探討與回應。

一、多民族問題

費孝通先生在論述“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時，分析了中國古代的民族交往關係。他指出：作為“核心”的華夏族在向外擴展時，對周圍所謂的夷、蠻、戎、狄采取了兩種策略，一是“逐”，一是“變”。以匈奴為例，這一策略的結果是北匈奴“走”

了，南匈奴“化”了。而大多數既逐不去又不受融合的“非漢民族”則以“祇有走到漢族不願去居住的地方”（大多是不宜耕種的草原和山區）的方式，繼續留在“西起帕米爾高原，東到太平洋西岸諸島，北有廣漠，東南是海，西南是山”這一地理上自成單元的東亞地區，也就是如今“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範圍裏。費孝通先生進一步闡釋說，這類“非漢民族”中的絕大多數“一直堅持到今天，在中華民族的一體中保留了他們的民族特點，構成多元的格局”^①。

這種論述強調了“多元一體”格局的族群^②基礎及其歷史關聯，並以“華夏核心”（漢族本位）的眼光，分析了古代“華夏”為主，“夷”、“蠻”、“戎”、“狄”居邊的“五方”模式。在這種

① 費孝通主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修訂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23。

② 中文裏的“民族”與“族群”，在使用上既相關又不同。一般來講，“民族”的含義規定性較強，而指代的時段多限於現代，難以涵蓋以往的歷史。“族群”相對要寬泛一些，能兼容較多的不同情況。比如“漢”、“壯”與“華夏”和“百越”，前者用“民族”，稱為漢族、壯族；後者用“族群”，叫華夏族群和百越族群要合適一些。當然，也有人對此持相反的看法，認為“民族”祇在古代纔有意義，用指現代時，不過是因特定需要“臆想”出來的“虛幻”共同體。參見徐迅：《民族主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總之，目前對“民族”一詞的含義出現了日益廣泛的爭論，而對“族群”的用法則尚無統一的定義。學界的情況是往往將二者并用或互用。這為今後的討論既提供了一些新的空間，同時也帶來了一定的麻煩。限於論述主題，本文暫不就此展開。需要說明的是，文中除了“少數民族”這一特指之外，多採用“族群”一詞，其義相似於西文的“ethnic group”。有關論述可參閱：李世濤主編《民族主義與轉型期中國的命運》，時代文藝出版社，2000年；馬戎：《關於“民族”的定義》，《雲南民族學院學報》2000年第1期；納日碧力戈：《現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構》，雲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王銘銘：《民族與國家——從吳文藻的早期論述出發》，《雲南民族學院學報》1999年第6期、2000年第1期。

模式裏面，由於華夏的擴張，居邊的其他四者被逐步簡化成了“逐走”和“化掉”類型，餘下的即演變為可稱為“內留一未化”的第三種類型。

不過，就“多元一體”格局的歷史演變來說，在上述東亞地區的這一地理單位裏，華夏並不總是中心；以夷、蠻、戎、狄相環繞的“五方”模式，祇是一種階段性的出現。在元和清等時代，不但“一體”易主，“多元”也呈現出結構性改變：取得王權的蒙、滿“蠻夷”，同樣對漢和其他被統治族群採用了逐、化、剿、撫并用的手段，再輔以或“羈縻”或“聯姻”的謀略，使之臣服於另一種模式的“多元一體”中。而在這樣的模式裏，漢族不也可照樣稱為“內留一未化”類型嗎？換個角度說，正因為人口佔絕大多數的漢民族“內留一未化”，中國範圍內的“多元一體”格局方得以鞏固和延續。認識到這一點，亦即把握這種超越“以我劃界”的换位思維，對客觀審視各民族的彼此依存和相互尊重非常重要。

可見，東亞地理單位中的“多元一體”格局，不但有其歷史的長期性，在具體的成因和模式的類型上也表現出多樣的特色，需要深入辨析。

從面對二十一世紀全球體系的視野來看，如今的中國已演變為一個疆界相對固定的現代多民族國家。其需要關注的基本問題，首先是如何對待國際社會的多元并存，其次是怎樣處理自身內部的“多元一體”，再次則是如何實現由古到今的社會變革。本書主要圍繞“多元一體”問題，以“腹地”和“邊疆”為對照，討論在現代中國的多民族國家階段中，“元”的意義、“多”

的象徵以及“一體”之演變。

展開之前，有必要對中國的歷史“大傳統”稍作回顧。

二、中國大傳統

中國是個歷史漫長的大國。作為空間遼闊、成分複雜，並經常通過中央集權方式進行治理的政治文化單位，當其統一的時候，其在人口數量和族群文化上的超大規模及多元結構，實與帝國相當。因此，認識和分析中國的傳統與現實，最好既聯繫一般的“國家”範疇，又參考特殊的“帝國”模式，同時亦不能忘掉其內部縱向延續的“王朝”前提以及分、合交替的演變周期。

就晚近七百年的變化來說，在經歷了分別由“蒙”、“漢”和“滿”三個族群輪流統治的元、明、清帝國交替後，中國的歷史可以說又進入了另一個強盛統一的階段。然而人們在面對“多元一體”結構的當代呈現時，無論現實的“開發”治理還是理論的分析，對與此相關的傳統和階段演變尚缺乏充分把握，從而留下了許多在觀念上有待拓展的空間。

元朝時（1279—1368），帝國的多元結構在政治地理上表現為橫跨歐亞的“大元”、“欽察汗國”、“伊利汗國”和“察喝臺汗國”等幾大板塊組合，而在東亞的中華範圍（元朝）內，則呈現為大體從北至南主要依次由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和南人等不同單位構成的區域和等級。

明帝國（1368—1644）的版圖較元收縮，並着重以萬里長城

劃分王朝疆界。不過，其從東到西，包含着兀良哈“羈縻衛”、烏斯藏“宣慰司”以及西南諸“蠻夷土司”轄地在內的領域，仍為多元混合的帝國結構。

清王朝（1644—1911）將再次擴大了的“中國”分為好幾個不同的統轄單位，即東北滿洲入關前的故地“盛京三將軍”，明故土上的“內地十八省”^①，以及西北蒙、藏、準、回諸部所組成的另外六區；與此同時，還在帝國內實行以“滿洲根本”、“國語騎射”為基礎，“滿蒙和親”、“漢滿分居”及“改土歸流”等相結合的基本國策^②。

中華民國承襲大清帝國的政治“遺產”，祇是把“滿洲根本”的王朝體制變成了漢、滿、蒙、回、藏諸族同治的“共和”國家——後來在提法上又補充了西南的“苗夷”族群——繼續統治在人口數量和領土版圖均堪稱超大規模的現代帝國。倘若再加上近代以來不斷蔓延至東南亞地區乃至歐美世界的“海外華人”群體，其波及和影響的範圍又進一步超越了以往的界限。

① 西方的學者也把此“內地十八省”稱作“中國本部”。照葛建雄教授的看法，這種稱呼祇是概念上的不同。葛教授進一步指出，清王朝之所以願意在外交場合接受和使用“中國”之稱，乃在於取其字面上所包含的“中央帝國”（centralempire）之隱義。參見葛劍雄：《統一與分裂——中國歷史的啓示》，三聯書店，1994年，頁37—39。

② 楊學琛：《清代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頁104—111；徐杰舜、章日科：《中國民族政策史鑒》，廣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408—454。